

警惕“市场化”异变为金融腐败的隐形通道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市场化”异变为金融腐败的隐形通道，一方面导致金融腐败发现难、认定难、查证难；另一方面隐形的贪腐会扭曲社会经济格局，增加企业正常经营成本，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腐败行为可能导致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内部审计监督机制流于形式，不能有效地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动摇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的落实，甚至可能冲击国家的金融监管秩序。

据新华社8月10日报道，近日，安徽省农发行原副行长操良玉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其利用职务之便，受贿382万元，借贷款为他人牟利。据了解，通过审批贷款收受好处，是这位银行高管敛财的一大“法宝”。2003年至2013年，操良玉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贷款人现金，为他人贷款事项提供帮助。另外，自2005年起，操良玉让其弟到靠他审批获得贷款的公司上班。随后6年间，其弟领取干股分红共计174万元人民币。

打着“市场化”的幌子，通过贷款审批方式直接获取回扣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隐形利益输送，已成为当前一些金融机构贪污腐败的“通行做法”。统计数据显示，一段时

间以来，“行长落马”在多地频发，受贿数额最高已上千万。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原副行长杨琨等20多人，这些人犯罪的方式不同，但都把贷款当成“唐僧肉”，以“市场化”的名义，靠签字批条变相造就“千万行长”。

一些金融机构的高管利用掌握的贷款审批权，采取暗中多种方式选择放款对象，表面上看符合相关规定，但实际结果是，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贷不到款，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却拿到了钱。有些高管热衷曲线获利，牟取“股权”，通过债券交易、股权转让等市场交易方式实施间接的利益输送，任内受

致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内部审计监督机制流于形式，不能有效地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动摇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的落实，甚至可能冲击国家的金融监管秩序。特别是些城商行、农商行，类似的问题比较明显，尤需警觉。

因此，一定要从制度、机制、监管等多方面进行防控，绝不允许以“市场化”为幌子、搞变相权钱交易之类的金融腐败行为蔓延。比如，消减行长“一支笔”现象，强调资金审批权责合一；推进金融改革，杜绝贷款“灰色成本”；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防止行业不正当竞争；强化金融高管的任后审计制度，适当延伸监管期限，减少信贷权力“期权化”的发生。

对习惯性傲慢说“不”

□张玉胜

市民冯先生今年5月份在广州公证处办理网页公证时，550元的项目被违规多收了1450元。经举报后，广州市物价局确认收费违规并责令广州公证处退款。广州公证处近日以发公函的形式通知冯先生前去公证处领退款。冯先生觉得对方此举十分傲慢，遂自制“红头公函”答复对方：要么将钱打到指定账户，要么预约之后到他的住处办理退款手续，且限于三个工作日内。(见8月10日《南方都市报》)

按照一般人的习惯，既然对方已经承认错误并书面“通知”了退还多收费用的事，只管前往领取便是。但冯先生并未轻易“就范”，而是从对方的行为中解读出了“傲慢”的意味。尽管以自制“红头公函”、模仿对方语气的方式回应对方，的确不乏调侃与滑稽，但仔细想来，这种回应的创意却不无维护尊严、敢于对强者的傲慢说“不”的社会效应。

由是观之，遏制“公函傲慢”，除了引入制度创新的机制改革，提升常态化监管的制约效力、加大违规问责的处罚力度，还需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监督力量，那就是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觉醒和善于监督的较真态度。如果每一位国人都具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公权傲慢自当有所顾忌与收敛。

的口吻，“道歉”在先、“请”字随后，方能显示其真心实意。透过改“退”为“领”的“公函”通知方式，人们不难看到某些部门和单位长期以来形成的傲慢和轻视公众利益的现象。

围观以“自制公函”答复红头文件的索要退款方式，其看点并非只是对领取方式的“较真儿”，而是对权力傲慢的“叫板儿”。如果为公证处的“公函傲慢”把脉，其病因大概有三：一是官办思维作祟，再加上公证处的特许经营地位助长了一些机构的底气，凡百姓“公证”事项必有求于我，不怕你不来；二是监督的机制乏力，公证处违规被查源于当事人举报，反衬出物价监管的不到位；三是违规成本低让一些人难有遵纪守法的敬畏之心，多收近乎三倍的“乱收费”，不过是一退了之的处罚，其震慑效力自然不高。

由是观之，遏制“公函傲慢”，除了引入制度创新的机制改革，提升常态化监管的制约效力、加大违规问责的处罚力度，还需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监督力量，那就是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觉醒和善于监督的较真态度。如果每一位国人都具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公权傲慢自当有所顾忌与收敛。



分级

据《新京报》报道，在新疆乌鲁木齐一家影院，13岁以下的观众是不能看《京城81号》的，即使买票，也会被做退票处理。因为该影城从7月中下旬开始实行“电影分级”。对于分级标准，影院经理介绍，包含较多暴力、血腥、恐怖等镜头的影片被归为特别辅导级，这类电影是禁止13岁以下观众观看的。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李法明/画 小郭/文



“捞人”的骗子缘何屡屡出没

□杨涛

丈夫被纪委带走调查，王女士想疏通关系让丈夫获释，结果被骗走1460万元。记者8月9日获悉，北京市高院终审以诈骗罪判处诈骗犯无期徒刑。(见《京华时报》8月10日)

按照正常的做法，如果有亲属被司法机关带走，当事人可以马上请律师，从法律上来帮助自己亲属找到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和法律依据。然而，虽然我国的法治建设

不断进步，但仍有一些人面对此类情况，不是找懂法律的人咨询应对措施，而是希望找到有关系、手眼通天的人来“捞人”，即便有些人找了律师，也往往是希望律师有关系能“捞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捞人”的生存土壤在一些地方是真实存在的。换句话说，王女士之所以上当受骗，是因为确有一些地方发生过有些司法机关，违背法律规定给一些犯罪嫌疑人提供方便，使其得到法律“照顾”。于是，现实中总有一些人抱有某种

幻想，期待通过某种非正常渠道使其免受应得的惩罚。

比如，前不久曝光的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通过一些人的关照和操作，在法庭审判中通过造假立功轻判，在监狱里通过造假材料减刑，进而在很短时间内出狱。再比如，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娄底市委政法委“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理由是“如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之类。试想，如果王女士找到了人，

说不定也能得到一纸“红头文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女士被骗事件再一次向社会昭示，尽管有关方面持续打击司法腐败行为，但要彻底根绝“捞人”现象，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比如，强化政府有关部门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坚决杜绝行政干预司法审判和执行的行为，非法干预的现象少了，骗子们大行其道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对那些自诩可以“捞人”的人，有关部门应该给予严惩，让其承受应有的法律责任，使其不敢动“歪念头”；加大普教教育力度，让那些深信“捞人”可行的人不再抱有幻想。



“酒烈士”：“人文关怀”还是“助长酒疯”？

——透视官员“陪酒猝死”背后的潜规则

新华社记者 李建国 凌军辉

“摔死”、“呕吐窒息”、“引发心脏病死”……这是公职人员近年来因过量陪喝酒，所导致的各种猝死悲剧。最新曝光的案例发生在安徽祁门县，当地公安民警朱磷陪领导“交流学习”期间醉酒摔倒。这些葬身酒坛的公职人员，一些还获得类似“烈士”“因公牺牲”或立功等待遇。

在中央多项“禁酒令”之下，这种“人文关怀”的善后，到底是遏制乱喝酒，还是在助推“喝酒风”？

安徽民警朱磷陪领导“交流学习”期间醉酒猝死事件持续发酵。8月10日，黄山市认定，这是一起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造成

不良后果的违规违纪事件，有关善后事宜现责成当地严肃处理。

在“八项规定”和地方多重禁令下，公务员“陪酒醉死”不时发生，这样的新闻显得刺目。地税职员、民警、镇干部……盘点“陪酒猝死”案例，大多发生在接待领导的酒桌上，喝酒的主力军，往往就是这些“陪酒”的普通干部。

2014年7月14日晚，湖北恩施州来凤县地税局一名年轻干部，因陪调研的州局领导喝酒过量而猝然身亡，事后通报称事发单位食堂；同年4月，广西来宾一副镇长上任首日在食堂喝“接风酒”死亡；2013年，黑龙江省委省一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

(上接第1版)
渐渐地，年轻人的发言少了一些高谈阔论的理论，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见和建议。青年人的“理论沙龙”逐渐成为省总机关里的一个激发“头脑风暴”的平台。

手段服务于现实问题

一个好的创意，如果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过程，仍然有可能仅仅留在纸上，最后流于形式。

“力戒工作创新中的形式主义，决不能发生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总工会主席童怀伟告诫工会干部们。

合肥市政府2013年将“省级职工书屋标准化建设”列为当年的政府民生工程之一，市财政和市总工会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分别对验收合格的标准化“职工书屋”给予项目建设资金补贴2万元和1万元。这项同样起源于对职工精神文化需求的调研，并经由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研究通过的议题从一开始实施时就严格按照有关要求不折不扣地进行。

鉴于“职工书屋”建设在合肥市取得了既“叫好”又“叫座”的效果，安徽省总积极推动其他市县借鉴合肥市的成功经验。目前，淮南、滁州等地已经开始将“职工书屋”建设纳入当地政府的民生工程。

今年“五一”期间，一名经由“职工书屋”淬炼过的职工——国网安徽宿州供电公司许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在处理干部醉酒死亡事件中，涉事单位往往凸显“人文关怀”，给予死者家属相当的抚恤金，补助动辄五十万甚至百万元，称系“因公”牺牲，追认“烈士”、立功等，引发公众愕然。难怪网友说这“酒烈士”比“真烈士”值钱多了。

酒桌办事、“圈子”提拔、“心瘾”难戒……

“酒烈士”现象背后，是“酒规则”的根深蒂固。

本来醉酒猝死是件不光彩的事，可如今，干部“醉酒而亡”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因公”，甚至成了“立功者”。一些基层干部说：“这实际上是让人放心大胆地喝，组织上都会替你考虑。”

很多时候“醉翁之意不在酒”。“记者采访发现，请客吃饭在一些干部看来又叫“做

局”，成为利益交换的平台。推杯换盏间可以拉近关系，继而提出正规场合下“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诉求。

“至少一斤的酒量、干得好可以转为公务员、女性、身高一米六二以上……”这是粤西某县在一场跨省招聘时提出的要求。“‘酒规则’横行，说白了是官场‘潜规则’当道。”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

如果不是意外发生，干部吃喝中的豪饮问题，依然会披着“工作餐”的外衣，藏匿于单位食堂、“八小时之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表示，要靠拔“喝出病”的“萝卜”，才能得出吃喝中的“泥”。

面对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陪酒成风现象，监督、惩戒力度仍显不足，缺乏具体处罚细则。要打破“酒桌办事”的局面，要严格追责。

专家认为，面对一些地方“两桌”不良风气的反弹，应建立事故责任倒查赔偿机制，要禁绝把乱吃喝“处理进”公务开支。继续推进更加规范的预决算公开制度。堵住财务报销漏洞，例如将公务招待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开支情况等定期公开，接受监督。顶风酗酒，追责。整治“酒风”，对广大基层干部来说，是解脱也是保护。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专电)

启金的事迹在多家中央媒体报道，这不仅在全省掀起了一股学习许启金的热潮，而且在全省职工中兴起了一股强烈的读书学习之风。

结果彰显出终极关怀

一切工作创新，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在促进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发展上。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安徽省委提出了“五个提升”的年度工作目标：科学发展推动能力进一步提升，工会组织凝聚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劳动关系协调力建设进一步提升，维权帮扶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工会干部队伍战斗力进一步提升。

结合“中国梦·劳动美·安徽篇章”主题系列活动，以及“固本强基、彰显活力”活动和为职工做好“十件实事”，安徽省委确定了一个“2510”全省工会重点工作。

去年下半年，省总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分成6个专题调研组，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座谈和发放调研问卷的形式开展针对非公企业劳动关系状况的调研，最终形成调研分报告6份，总报告1份，其中总报告深入分析了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状况的现状，提出进一步加强非公企业工会工作、构建非公企业

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建议。报告得到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的专门批示，为省委、省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制定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针对开发区、工业园区兼具企业密集、产业关联、职工集中等特点，今年，安徽省委着力加强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工作。全省选聘55名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进驻开发区，安排100万元经费重点推进园区帮扶站点建设。

为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创新职工技能培训班新方法、新途径，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工商联等单位共同举办安徽省委首届职工技能技术比武运动会，组织166个工种200万名职工参加比赛。同时延伸全省“十大能工巧匠”评选领域，首次开展“安徽省十大带徒名师”评选，进一步深化名师带徒、师徒结对活动。

为了最大化地发挥劳模精神的正能量作用，安徽省总从4月下旬开始，在全省5000辆省际客运班车张贴劳模车贴画。同时，芜湖、马鞍山、宿州等市400辆公交车也张贴了劳模宣传画。全省城乡出现了一道道靓丽的劳模风景线。

立意高、目标高、要求高，安徽省委工会一系列的创新举措带来的变化是，职工群众得实惠，工会形象得提升，社会和谐得发展。

震灾，一个村庄的“诉说”

(上接第1版)

而在6公里外的江边村委会，记者看到，房屋均为钢筋混凝土砖房，房屋有受损，但没有一幢倒塌伤人。村民彭代住告诉记者，“如果新发村的房子也是钢筋混凝土砖房，就不会倒塌伤人。”

“就是买了砖也运不进来，你瞧这个路走牛车都困难。”村民李立文忍不住叹气。

家已是汪洋一片

地震时，新发村村民崔世荣正在采摘花椒，猛烈的力量把他从树上颠下来。惊魂稍定的崔世荣，立即往山下村子奔去，他平时在昆明黄土坡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因为要摘花椒，7月5日他才从昆明回到家。

唐耀民和崔世荣一样，惊魂甫定，立即奔赴垮塌房屋用手刨土救人。“我们刨出来5个人，死4个，活了1个。”他伸出指甲盖里尚有泥土的双手，“等救援队来了，刨出来的两个人都死了。”

(本报云南会泽8月11日电)

“龙头山镇最忙的人”

(上接第1版)

到达龙头山镇，是晚上5点半左右。地震刚过去一个小时。

“到处都有人在喊救命，镇政府二楼变成了一楼。派出所的土坯房全倒了，6名干警都被埋在下面，有个小伙子当时被埋在废墟下，他拉着我的手喊我救他。我和旁边的人把他刨出来以后，用门板抬到镇上的医疗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卢敏眼眶泛着泪花，“镇政府的一个小伙子的女朋友来看他，也死在里面了。”

“看到当时的情况，害怕吗？”记者问道。

“怕！怕个(为什么)怕？但是那个时候都来不及害怕，到处都是呼救声。”卢敏立即组织灾民们展开自救。

采访过程中，卢敏不停地接电话。当记者问她家里的受灾情况时，卢敏说：“没有时间顾那么多了。”据记者了解，卢敏家住鲁甸县城，女儿在昆明上学。但对于具体情况，她始终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8月3日晚接到的一个电话，卢敏记得清清楚楚，“晚上7点半左右，接到昆明一个座机电话，那边说省委书记要和我通话。秦

（本报云南会泽8月11日电）